

公路治超“钞声依旧”源于以罚养人

任小康

云南省审计厅日前完成的对云南4个州市车辆超限治理工作专项审计调查显示,超限治理经费大部分用于人员支出,占总支出的52%;公路维护保养及站点建设仅占总支出的16%,公路养护资金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中国青年报》7月22日))

在很多地方,“治超”等于“制钞”。交通运政等执法部门在公众眼中,就是一个专收“买路财”的机构。尽管媒体隔三差五曝光,上级部门三番五次整顿,治超乱象依旧,简直成了一只打不死“小强”,原因何在?云南省审计厅公布的上述数据或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

治超罚款本身并没有“原罪”,在美国,超载行为在受到刑事诉讼前,也会被处以罚金。在国内的相关制度设计中,罚款既可震慑司机,也可弥补道路维修资金的不足。但从云南的审计结果看,其良好初衷似乎并未达到。

一方面,审计报告认为四市“车辆严重超限超载态势基本得到遏制”,难免有玩文字游戏之嫌。4个地市2012年共收缴公路超限赔偿和罚没款39130.08万元,平均下来一个地市近1亿元。没有大规模的超载,如此多的赔偿和罚没款从何而来?另一方面,4地市收缴的公路超限赔偿和罚没款,52%用于人员支出和机构运转,而用于公路维护保养及站点建设支

出仅占总支出的16%,满打满算一地市用于公路养护的资金只有1000多万元,这点钱用来维护庞大的公路网,无异杯水车薪。

这些年,各地的治超乱象被曝光后,相关部门无不表态“高度重视”“彻底整改”,但落到地上不过是处分几个当事人,风头一过又是“钞声依旧”。去年11月14日,在河南永城市境内,一名货车司机被当地运政和路政执法人员拦下,由于执法人员坚持罚款,女车主当场服农药自杀。交通部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交通运输行业公路执法专项整治活动,检查结束后,多路央视记者再次对山东滕州等地的公路交通执法进行了调查,发现乱罚款、只罚款不卸载等现象依然存

在。

要有效治理治超乱象,还得把视线更多地从“盯事”向“盯人”转变。按照《公路法》等法律规定,治超罚没收入只能用于道路和超限站设施维护。然而,昆明等4个地市收来的超限赔偿和罚没款,其支出部分超过一半用在人头上,这几个地方的治超人员究竟有多少?何以“吃掉”一半的支出?尽管目前尚未披露原因,但云南省审计厅认为“公路管理体制不顺畅,机构设置重复”,或许已经说明问题。

在很多地方,治超机构人浮于事,为养人而不得不“放水养鱼”“弹性执法”,这些早就是“公开的秘密”。就在发生“车主不堪罚款服毒自杀”事件的永城市,

路政执法人员编制数量本已达到110人,而实际上他们还聘用了大量编外人员。知情人披露,当地路政大队的人数至少是编制数的两倍多。不在编制内的人员,就要靠罚款来养,即罚100元,发给执法人员70元。

如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燕继荣教授所言:罚款按目的区分大致为三种,即以罚代管、罚款经济和以罚养人,而设置岗位专门罚款供养执法人员,是最恶劣的情形。面对云南省审计厅发现的治超费用乱局,到底该如何找到突破口?笔者以为,彻底清查基层执法部门人员的恶意超限行为,并对外公布举报渠道,接受民众和媒体监督,或许可以作为破题之策。

民营银行何时问世

余圭慧

阿里巴巴已经联合其他发起方,作为阿里银行的发起人向地方银监局提出了民营银行申请,并提交了相应的试点方案。但从浙江银监局获悉,阿里银行的获批仍没有实质性进展。民营银行何时问世,仍是个未知数。((《经济参考报》7月22日))

无奈之下,阿里巴巴已经开始悄悄演练起阿里银行的主营业务。7月22日,阿里已推出“网商贷高级版”的互联网金融服务,这一服务将以阿里的大数据能力为基础,通过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等银行向阿里旗下多个电商平台上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服务。

阿里放开外贸出口平台,打通大数据,不但有利于几家银行快速获取中小微出口企业的信用、业务、财务、现金流、商品库存周转等数据,从而发放贷款支持出口企业,而且对于阿里来说,也进行了阿里银行成立前的主体业务——贷款资产的预演,为未来成立阿里网络银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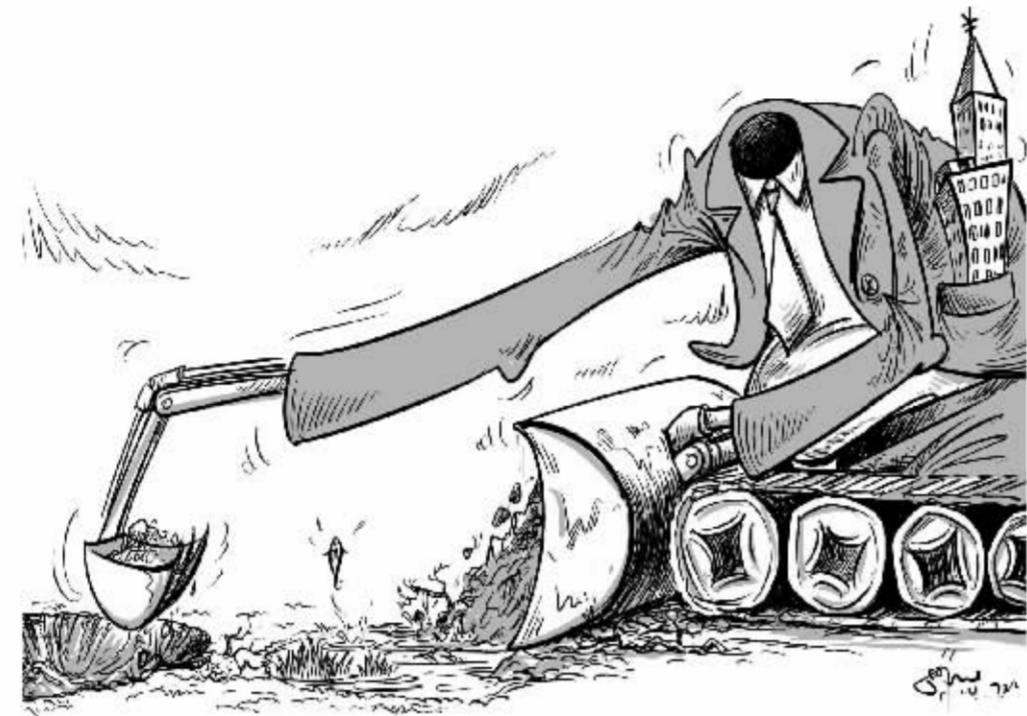
金融的核心在于信用,金融管理的关键在于对风险的管理。而信用与风险又是紧密相连、相互作用的。过去对法人和自然人信用财富浪费严重,几乎将讲信用和不讲信用者都当做失信之徒看待,使得大多数讲信用者被“冤屈”。金融机构包括银行没有获取和鉴别法人和自然人信用状况的手段,只有采取“宁可错杀1000也不放过1个”的无奈之举。

电子商务的大发展解决了金融的核心问题——信用状况的捕捉和获取,进而大大提升了防范金融风险的水平。未来的网络银行可通过对网络平台上大数据的挖掘,快速获取企业信用状况,作出对其贷款与否的决策。有了获取信用的手段,一切都变得简单了。金融交易包括贷款不需要抵押担保质押,24小时就可以放款到企业账户上。

有信走遍天下,不仅可获取信任而且能获得融资,这会使整个中国形成正向激励:信用越珍贵越值钱,人们越珍惜和积累自己的良好信用,讲信用守合同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整个社会的信用状况将会越来越好。

中国不缺传统银行和国有资本银行,缺的是创新型的网络银行。中国电商发展很快,但对于电商网络平台上的大数据金融挖掘远远不够。目前,阿里小贷公司已经吞下阿里所有网络平台上大数据金融融资信。出路有两条:一是如前所述,阿里逐步放开平台数据,引入传统银行开展金融业务。二是阿里、腾讯等有实力、有条件的公司尽快成立网络银行,挖掘平台上的金融大数据。

民营银行从去年动议开始已经一年多,从今年3月公开宣布五家试点名单,已经半年有余。至今没有一家挂牌,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应该有一个可供社会监督的时间表和进度表。监管部门大可提高行政效率,尽快审批,让其尽快挂牌。传统银行的经营模式与互联网金融相比较,已经落伍,应该扩大网络银行设立面。



“吃空饷”涉嫌贪污罪

王学进

河南三门峡渑池县教体局长女儿“吃空饷”一事有了下文:7月21日,记者从三门峡市纪委获悉,该教体局局长刘彦民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目前在国内几大网站上,仍然可以搜索到“渑池县人社局(现教体局长)刘彦民女儿带工资上学”的举报帖子。((《大河报》7月22日))

该案发生在2010年,刘彦民当时任渑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后调任教体局长),他利用职权将刚入读河南师范大学的女儿安排进该县教育局教研室,三年来女儿已领取财政工资和福利补助8.75万元。去年10月该消息被媒体曝光后,三门峡市纪委表示会严查此事,谁知大半年过去,只给了刘彦民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轻处“吃空饷”者,刘案不是孤例。如陕西大荔县副县长任教训,为正在上学的儿子办理了工资关系,从2011年11月至2013

年5月累计领取财政资金45096元,案发后,任教训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连个“严重”都没有,稍微严厉点的处分是免职,如山西省长子县教育局原局长李福刚安排儿子在教育系统“吃空饷”,被免职;湖北襄阳市襄州区财政局副局长罗世群将在高校读书的儿子安排进区财政局“吃空饷”,被免职等,从未有哪位官员受到刑事处罚。

“吃空饷”,无论从主观故意还是造成的恶劣后果看,性质都十分严重,不但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还须给予刑事处罚。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吃空饷”的行为在法律上属于典型的不当得利行为,与贪污公款无异,符合《刑法》上对贪污罪的定义:“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申曙光观点也很明确,他说:“吃空饷”是套取国家财

政,是典型的犯罪行为。光是地方清理或者自查自纠,显然无法触及违规者的痛处。”申曙光表示,要想真正查处“吃空饷”问题,就必须站在惩治腐败问题的高度,在追究其违法所得的同时,更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据报道,人社部正在研究制定治理公职人员“吃空饷”和解决超编用人、编外用人的政策措施,并已被明确纳入下一步的工作安排。接近人社部的人士表示,“在治理‘吃空饷’问题上,将会形成一个长效的问责机制,‘吃空饷’者、部门领导各应承担什么责任,都会有严格的规范和惩罚标准。”((《华夏时报》2013年11月1日))

由人社部制定一个治理“吃空饷”的新政很有必要。在期待新政早日出台的同时,笔者更希望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明确两点,一是将“吃空饷”定义为腐败,司法机关将吃空饷的行为明确为贪污罪;二是行政主管部对那些利用职权安排子女“吃空饷”的官员,免职后移交司法机关,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

大学生暑期支教不是添麻烦

记者观察

张鹏(《中国青年报》记者)

这几天,接到好几个大学生的电话,都是向我求助:能不能帮忙联系一所学校?他们想利用这个假期,到乡村学校去支教。之前,他们已经联系了一圈,均遭到了拒绝,大学生们感到自己的爱心很受伤。

校长们拒绝大学生的理由,客气点的,以“暑期学校正在搞基建”、“学生要干农活,不好组织”为由搪塞;不客气的,“我这个校长一年就有个假期可以休息一下,你还不让我休息”、“我们无权接收你们,你们联系教育局”……其中突出的理由是:“事关学生安全,责任重大,出了问题,谁来负责?”一些基层的校长面对大学生的支教请求,面露难色,原因还不只是担心出事。

对大学生暑假短期支教的批评声,早已有了,归纳如下:一是准备不足,把乡村支教当成了乡村旅行。二是“来去匆匆”,时间短,传授不了多少知识。三是支教“后遗症”。当乡村学生喜欢上支教

老师先进的多媒体教学、正确的英语发音后,乡村老师传统的教学办法“不灵”了,大学生走了,把难题留给了老师。

在笔者看来,大学生暑期支教,时间虽短,但不妨碍这群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芒的大学生把外界的生活方式、先进的文化、科技带进大山,帮助山区孩子们打开视野。很多大学生的支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授课。他们把音乐、舞蹈、武术、书法、摄影甚至生理卫生知识和求生本领等带到了农村孩子。对乡村孩子们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启蒙。

不少大学生志愿者还成了沟通乡村和城市之间的桥梁。他们在支教体验生活的同时,通过新媒体的传播,把更多乡村学校乃至乡村社会的现实呈现给了城市的公众。因为支教引发的故事不胜枚举,类似“捐衣捐物”、“旧书回收”的公益活动时常常见诸报端,这些流淌着爱心和善意的城乡互动为社会注入了正能量。

至于说农村孩子更喜欢大学生活泼的教学方式,乡村老师的权威被打破了,这恰恰也应该是乡村学校的老师们应该学习和反思的。对教育工作者而言,这样的教

学方式以及施教理念的碰撞本身就很有价值。

至于安全问题,当然应该成为重中之重,但不能“因噎废食”。通过周密的方案,严格的纪律,加上爱心和责任心,安全问题可以有保障。每年暑假前,一些尝到甜头的基层教育部门,就在网络上发布支教信息,欢迎大学生团队前往支教,并安排专人为大学生排忧解难,我们要为有这样有担当意识的教育部门点赞!

面对大学生在支教过程中表现出的不成熟,也应该多给予宽容,这本身就是成长的一部分。不能因为极个别学生表现出的不成熟,就否定支教本身的意义。当然,大学生支教仅有热情还远远不够,应该拿出更专业的支教表现,才能赢得尊重。

表面上看,大学生暑期支教,让教育部门和学校“多了一事”,添了负担和麻烦,但从“算大账”的角度,接收大学生支教,呵护了青年的爱心,让一些政府暂时无暇顾及或者遗忘的地方,得到了有益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给青年的成长提供了“接地气”、“长本领”的舞台,受益的将不仅仅是大学生。

“碰瓷”遭碾该当何罪

杨涛

一段行车记录仪记录下来的视频日前在网上疯传:一个碰瓷男看到一辆车开过来,顺势倒在车前面;女司机不知是没看到人还是一紧张,左右张望一番,就直接开过去了。

大凡是“碰瓷”的,不过是想借此讹司机的钱财,不想让自己身体受伤,肉体受苦。可这位“碰瓷男”很不幸运,被车轮轧了过去,非死即伤,代价可大了。

尽管坊间对此一片叫好声,一些曾受“碰瓷”威胁之苦的司机也很解气,但是这毕竟涉及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必须在法律层面厘清责任。

从画面上看,司机很可能没有看到有人“碰瓷”倒地,才径直开了过去。如果是这样,“碰瓷”者就白白被轧了。这种可能性最大,因为车子本身存在视觉盲区,司机视野受限,没有看到“碰瓷”者完全有可能。如果事故真的被认定为这种情形,司机造成“碰瓷者”死伤,可不负任何民事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还有一种可能,司机看到了“碰瓷”者倒地,但一紧张还是碾轧了过去。这里要区分两种情形:一是,如果车子本身没有停下来,碾轧是一瞬间、连贯性的动作,这种死伤主要就是“碰瓷”者的故意行为,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司机不负民事赔偿责任

和刑事责任。二是,如果司机看到了“碰瓷”者倒地,车子已经停下来了,但是因为害怕,一紧张又加油碾轧了过去,这种情形司机存在过失行为,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的问题。至于具体承担多大责任,需要交警结合当时情形和双方过错来具体认定。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司机看到了“碰瓷”者倒地,知道来者不善,尽管她的车子已经停下来了,但一生气,故意加油碾轧了过去,造成“碰瓷”者的死伤。这种情形下,尽管“碰瓷”者过错在先,但司机主观上存在故意。司机仍然面临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当然可能适当从轻处罚。但这种情形下,正如司机很难证明“碰瓷”者是故意造成伤害一样,司法机关和“碰瓷”者也很难证明女司机的行为是故意的。人的主观意图通过许多外在行为进行表现,如果证据很难获取,“碰瓷”者就可能面临被碾了白碾的局面。

不过,无论女司机是否要承担责任,“碰瓷”者只要没有死,都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碰瓷”这种讹诈他人钱财的行为,情节轻微就要受到治安拘留的处罚,情节严重就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碰瓷”者如果玩火自焚,搞不好还可能丢了卿卿性命,碾了白碾。

当然,为司机叫好的看客们,也不要盲目效仿司机行为。如果真发现“碰瓷”者,车子又停下来了,那还是赶紧打电话报警。盲目碾轧过去,也可能要承担民事赔偿甚至牢狱之灾。

互联网企业撬动技术创新

怡文

7月14日,习近平主席抵达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并对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古巴四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的热点之一,是随行代表团与拉美四国签订的多项“大单”。西班牙《国家报》发表文章说,10年来,中国与拉美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了22倍,成为该地区的主要投资国。中拉贸易在本世纪头几年主要是以原材料贸易为基础,由中国大型国企收购或与当地企业合作进行资源的开采,此后双方贸易的重点转向多元化,而现在则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和高科技行业。

中拉贸易额激增的背后,是中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转型升级。这体现在诸多方面,例如,国家领导人出访随行代表团的构成,从历年的情况来看大致分为资源型、贸易型和技术型三个层次:在1980年代,国家领导人出访随行的企业代表团,多来自资源采购型的大型国企;此后,随行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变成了来自江浙的民营企业,多专注于制造和商贸;而近年来领导人出访的随行代表团,则成为高科技和创新产业企业的活跃舞台。

由小见大,随行代表团构成的变化,也见证着中国努力从“制造大国”向“创新大国”的转型。业界人士在谈到随行代表团构成时,曾说过一句经典的判断,即随行代表团的构成“要看对方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政府出访的目的是什么”。这句话包括着两个含义:一是科技创新实力,正在越来越多的场合成为国家的竞争力;二是大力发展和推动科技创新产业,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

提升的需要。

具体到习主席近期的韩国、拉美两次访问行程,代表团中则既有大型国企、合资企业,也有中小型企业,它们涵盖农业、金融、运输、能源、制药、信息工程和绿色经济等多个行业,其中与以往相比,最引人注目的是以互联网公司为代表的高科技创新企业的频频登场。例如,习主席访韩时,李彦宏、马云、任正非、王晓初等高科技行业的“明星企业家”随行,成为中韩经贸合作论坛上的焦点;拉美之行中,百度发布韩语搜索,让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再次受到关注。

正如李彦宏在中韩经贸合作论坛上发表的科技撬动“亚洲新时代”的演讲所说,中国已经跃居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吸引到一批优秀的海外科技人才,相比过去,中国比美国有更多机会,更早地面对来自用户的新需求,以及由于这些需求汇集而带来的新机遇。可以预见,“未来会有更多技术和产品的创新诞生于此”。

互联网产业不断增强的技术创新实力,将积极促进中国的创新之路。随着移动互联网在全球的普及,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与互联网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互联网领域的每一项科技创新,都可能给社会的发展以及个人生活带来变革。如何让互联网更好地推动社会进步,如何通过互联网来提升执政能力和公共管理能力,正成为各国政府都很关注的问题,其间,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科技是一个国家“硬实力”的重要体现,中国需要一批在科技领域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带动整个社会创新的步伐。

储朝晖

因为决定着考生的最终“去向”,招生模式比考试模式更为关键和重要,甚至可以说,招生决定着考试。

中国的科举考试事实上是选官考试,1950年后的统一高考招生,在很长时间内实质上也是选拔培养干部的考试。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突出,高校培养与社会人力资源需求严重脱节,现有高考招生制度的功能与职能错位及其相关问题就更加突出。因此,须及时实现高考招生主体的变换,回归教育行业内的专业测试和学生选拔制度。

这一变革可简单概括为:将高考招生从“指挥棒”变为服务人才成长发展的“服务器”,从现行以行政为主导的

自由谈

高招应从“指挥棒”变成“服务器”

——高招改革的困境与出路(中)

计划招生,转变为专业为基础的自主招生,扩大高校和学生选择权,以学生为本,建立自主、专业、透明、公正的考试招生制度。

将高考招生的功能定位于服务器,就是要能培养独立思考、独立创造,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人才服务,能与课程、管理、教学等资源配置,发挥服务不同人才成长的作用。

高考招生改革的理想境界就是让考生的“服务器”,从现行以行政为主导的

自主判断、自主选择上自愿结合。消除招生办这一强势“媒婆”,形成平等、尊重、和谐、发展的生、校关系,从而增强学生信心;让层次不同的高校通过自主地专业团队程序化的判断,招收到自己要求的最优秀的生源,从而在整体上形成分层分类的选择机制。

当下有高度共识的是,分数决定一切,一考定终身,是现行高考最大的弊端。相对于没有客观依据的推荐,看分数是进步;相对于全面的专业评价,仅

看分数又是肤浅、粗放、落后的。以专业的方式评价学生,就不会由分数决定一切,就不会一考定终身。要让政府从招生主角退出来,使考生与高校成为真正的主角,但目前,这种改革会遭遇重重障碍:一是当下的社会依然是官本位的体制,政府管理体制和社会文化氛围镶嵌在严格的科层组织中,大学本身也是个官僚机构,未能建立规范的权力监督制度,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基础极为薄弱,在这种环境里要建立一套专业的、公开透明的考试

招生体系确实相当有难度。政府能否从高考招生中退出,取决于政府管理体制是否顺利,政府放权能否到位。

二是专业团队能否及时顺利建立。改革后的招生需要极其专业的、大规模的专业团队参与,能否有足够的专业人员组成专业团队,能否建立并遵循专业的规范,能否严格依照专业的规则和程序履行职责,能否获得社会公众足够的信任度,也将考验着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三是利益的障碍。高考招生制度改革

既然以更加公平为目标,就必然要调整原来计划体制下的特权利益,使一些地区、部门和人士受到影响,因此也会遭到来自这些方面的阻力。

考试招生改革当下最大的困境是,在现有的框架内,需要现有体制中的人设计出一个改革自己的方案,等于向自己开刀。如果只是由教育部门制订、公布高考改革方案,再由教育部门来实施,恐怕会事与愿违。历史上,无论是废科举还是恢复高考,都不是教育部门自行设计和实施的。当没有明确谁来改革的时候,这场改革事实上还没有真正开始。如果还停留在指望教育部门制定高考招生改革方案,那就是高考改革的定位仍然不明,仍然未走出困境的表现。

(作者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